

# 进展与展望：清末民国时期孔庙问题研究

■ 郑 双 / 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清末民国时期孔庙的命运遭际是管窥儒家学说乃至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视域。近年来，该问题已经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研究主要从孔庙的价值功能定位、修缮活动以及庙产纠纷三个角度展开，成果斐然。但同时，既有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诸如相关研究关注面狭窄、区域个案研究较多、研究视角单一等。故此，今后研究者有必要拓宽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扩大史料的取材范围，尽可能呈现孔庙问题的整体面相；同时，也应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以期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脉络中理解孔庙在近代的多舛命运。如此，方有望继续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清末民国；孔庙问题；价值功能定位；庙产纠纷

传统时代，孔庙作为祭祀孔子及后世儒家先贤并进行社会教化的神圣空间，备受当权者和儒学士子推崇。然而晚清以降，特别是人民国后，伴随着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终结，孔庙境遇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动。首先，因科举制废止以及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孔庙原本承担的教育功能逐渐被新式学堂取代，孔庙庙学合一的体制最终走向终结；继之，在时代变革和社会改制的栉风沐雨中，孔庙的修缮活动、庙产的归属与再利用情况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清末民国时期却以前所未有的复杂面貌呈现出来。凡此种种，不仅反映了新旧交替之际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对孔庙的认知与定位，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孔庙，或其承载的儒家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之艰。目前，这一重要的历史命题愈来愈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果，但仔细审视，尚有诸多不足。鉴此，笔者拟对此加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析与展望。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 一、孔庙的价值功能定位

传统时代，孔庙不仅是祭祀孔子及后世儒家先贤的场域，还是教化、管理生员的重要空间。然而清末以降，受西方文化冲击以及科举制废止的影响，孔庙“庙学合一”的体制最先受到冲击。就孔庙为生员进学的教化功用而言，自清末新政时起，个别地区为解决各府县在兴办新学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场地难寻等问题，已经开始了将文庙改做新式学校、图书馆等教育机构的尝试。张亚祥在考察江南文庙时就发现，晚清最后十年，苏州府文庙、江阴文庙以及南京夫子庙的部分建筑已陆续为“新式学堂”所占<sup>[1]</sup>。霍红伟则在列举了清季各地孔庙改作新式学堂的部分实例后指出，清季民初时期孔庙被改作新式学堂的事

项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孔庙传统“学”的功能丧失殆尽，且孔庙日益被边缘化，则是不争的事实<sup>[2]</sup>。

在孔庙传统“学”的功能丧失殆尽的同时，其祭祀功能并未随之瓦解，而是依旧受到当权者的认可。1906年，在儒学日益式微的大背景下，清廷试图继续借助于孔庙的祭祀功能统摄人心，故而赫然将孔庙祭祀制度由中祀升为大祀。对此，学者李俊领认为，由于处在清末预备立宪的特殊时刻，孔庙祀典升格虽在民间取得了部分儒学士子的支持，但并未引起朝中大员们的重视，甚至招致了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疑清知识分子的批评与质疑。在他看来，大祀孔子“劳而无功”，主要在于此举不能从制度、信仰层面改变孔子和儒学日益衰颓的地位，且与清末新政提倡的宪政大趋势背道而驰。<sup>[3]</sup>与之相近，学者张国鹏亦认为，晚清当权者尽管将孔庙祭祀制度由中祀升为大祀，但并不能改变孔庙神圣空间地位悄然滑落现状。<sup>[4]</sup>这些研究充分表明，清季孔庙祭祀活动虽得以延续，但其工具化利用的功效已远不如往昔。

人民国后，因官方政策迭经更易，孔庙命运几经浮沉，其价值功能定位亦随之转变。最初，由于体现礼教精神的孔庙祭祀制度与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社会理念格格不入，孔庙祭祀制度遂被当政者改造为具有现代性的仪式纪念，孔庙的纪念功能渐次取代其祭祀功能。美国学者柯必德即持此种观点，他在爬梳清季民国时期苏州地区孔子诞辰纪念活动的发展流变时就指出，孔庙作为孔子诞辰纪念的场域，虽为普通民众进入孔庙提供了可能，但此举同时也削弱了孔庙的神圣性，孔庙的祭祀功能最终完全被纪念功能所取代，并进而演变成宣扬民族主义的公共纪念场所。<sup>[5]</sup>与之不同的是，不少学者虽然留意到民国时期孔庙纪念活动的仪式、意涵层面均同传统时代有着明显差异，但他们依旧将转变后的功能笼统地概括为孔庙的祭祀功能，而非纪念功能。如陈悦在爬梳祭孔活动在近代的演变轨迹时，尽管已经注意到民国时期祭孔仪式呈现出现代性的样态，但仍笼统地将其称之为孔庙的祭祀功能。<sup>[6]</sup>当然，大多数学者注意到，此时的孔庙被定位为文物古迹、现代性公共教育空间或政治宣教空间存在的事实。如马春霞即重点研究了文庙转变为现代性公共教化空间的过程。她以1916年前后江苏文庙被改做通俗教育馆事件为例，指出孔庙不复为封闭式的祭祀空间，转而被改造为意在向民众普及常识，提高国民素质的公共教化空间。<sup>[7]</sup>张国鹏则以上海文庙为例，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北京政府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当政者对于上海文庙的不同功能定位。他认为，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孔庙承载的道德价值于民国肇兴之际便受到多方攻讦，作



1929年即墨孔庙毁于战火



1935年孔庙成为长崎华侨新生活运动开会场所

为孔庙传统功能之一的祀孔活动一度中断，孔庙由备受士子尊崇的“圣域”被改造为向民众宣扬共和理念的道场；但此后，面对社会失序、民众行为失范等乱象，北京政府在对祀孔旧典稍作修订的基础上再次推行文庙祭祀活动，以期利用文庙所承载的道德价值发挥其教化民众、统摄人心的作用；待及北伐战争后，在革命的强势话语下，文庙复被定位为现代性的公共文化空间，原为祭祀之用的上海文庙也被移作供市民休闲学习的公园和民众教育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出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目的，将革命话语、党义学说等因素附加于文庙固有场域之上，文庙复被改造为宣扬民族大义、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政治宣教空间。<sup>[8]</sup>无独有偶，学者庞毅以长沙文庙为例对近代孔庙功能定位多元且模糊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民国以后作为兴学、祭祀之用的文庙，其定位日益受到“城市公共空间扩大的冲击”，1921年，长沙市政公所与警察厅共同向省署提议，将三处学宫改作供民众休闲之用的公园，但此项提议最终以妨碍文庙兴办学校为由被驳回。<sup>[9]</sup>该文为理解孔庙的现代性功能定位问题提供了较为详实的案例，但美中不足的是，庞文论述的过于简略，未能像张文一样将促使孔庙功能发生转变的原因以及民众对于孔庙功能定位的反应展开全面剖析。学者杨莉在其专著中，也介绍了文庙功能定位模糊的问题。有所不同的是，杨莉从官方和地方士绅两个群体的角度窥探此问题。她指出，为改变文庙的萧疏境遇，天津地方士绅试图采用“祭祀+节庆”的方式将文庙改造为集祭祀功能、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而官方则在祀孔活动之上，嫁接了符合自身需要的政治理念以及现代性的仪式，将文庙形塑为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教化空间。在她看来，当政者与地方士绅对于文庙的功能定位出现了错位和背离。<sup>[10]</sup>此外，针对孔庙近代功能定位模糊的原因，学者黄进兴从宗教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这同儒学的国家宗教性质不无关联。因儒学非个人的

宗教，故而在封建帝制终结后，孔庙祭祀制度顿失所依，孔庙自然难以在现代社会寻求新的立足点，其功能定位亦模糊不清，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也就渐行渐远。<sup>[11]</sup>

## 二、孔庙的保护与修缮

在古代中国，孔庙实体建筑作为儒家文化的尊严承载以及政治权力的投射，其保护与修缮问题深受当政者和地方士绅重视。以天津文庙为例，仅康熙年间就曾先后六次修缮，平均修缮周期约为十年，而实际中修缮时间相隔最短的一次仅为两年，修缮次数不可不谓频繁。然而近代以来，孔庙的保护与修缮状况却大不如从前。尽管部分坚守儒学传统价值观念的当政者和地方士绅依旧热衷于修缮孔庙，但修缮活动时常因财力不济、舆论反对等因素不了了之。故而，孔庙庙貌频频受到侵扰，诸如“文庙芜秽不堪”<sup>[12]</sup>“被人任意损毁，胜迹日就消灭”<sup>[13]</sup>等语时常见诸报端，孔庙不复往日庄严。长此以往，不少孔庙面临着年久失修、倾圮坍塌的尴尬处境。但综合观之，受尊崇儒思想以及官方统治的需要，清朝末年以及20世纪的20年代、30年代还是兴起了三次规模较大的修缮热潮。

首先，部分学者对清朝末年因孔庙祀典升格而兴起的修缮热潮进行了考察。如李俊领指出，1906年，清廷将孔庙祭祀制度由中祀升为大祀，并提出孔庙建筑配置同样按控制升格的要求。但在具体实践中，京师和大多数地方孔庙受修缮资金等因素的影响未能如期完成修缮任务。以京师孔庙为例，因当局财政匮乏，又深陷立宪运动之中，人浮于事，修缮活动迟迟未能动工。<sup>[14]</sup>王君怡在对清末郑州文庙的修缮活动加以考察后发现，除1896年和1898年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修缮活动，郑州文庙并没有因1906年孔庙祀典升格而加以修缮。<sup>[15]</sup>

其次，亦有一些学者对民国时期孔庙的保护与修缮情况进行了研究。如王君怡在研究郑州文庙的修缮活动中指

出,相较于清季修缮活动由地方知州主持,1915年郑州文庙的修缮活动改由地方教育家李光华主导,绅民辅以配合,且绅民的参与程度有所提升;而至1930年代,修缮工作的主导权则交由地方政府接管。相应,修缮资金的筹措方式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作者对此转变着墨不多,个中缘由亦难得知。<sup>[16]</sup>刘守柔撰文指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反复兴起的“尊孔崇圣”思想,引起了时人对保护孔庙建筑的重视;加之新生活运动倡导儒家道德、中原大战焚毁了部分曲阜孔庙建筑等因素,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于孔庙修缮活动的关注;她还认为,30年代兴修与保护孔庙的举措蕴含着当政者借孔庙增强民族凝聚力以抵御外侮的期望。在她看来,曲阜孔庙修缮计划因耗费甚多,在社会上并未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甚而有民众对保护孔庙建筑之必要性产生了质疑。<sup>[17]</sup>赖德霖则重点探讨了新生活运动同1930年代孔庙修缮活动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新生活运动发起后,国民政府对孔子愈加推崇,曲阜本庙的保护与修缮工作也相应获得了更多关注。作者指出,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曲阜孔庙修葺计划的准备工作逐步展开。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对修葺计划的具体实践情况详加考察,仅是对新生活运动与曲阜孔庙修葺计划间的关联作了简要的概述。<sup>[18]</sup>杨宇振、杜林东以档案资料和报刊报道为基础,系统梳理了1941年国民政府修缮重庆文庙事件,他们认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民党当局有意借修缮文庙增加民族凝聚力并进而强化自身统治的正当性,但因修缮机构间权责不清、重复设置,使得修葺计划进展缓慢;加之占用文庙的机关迟迟不肯迁出,导致了修葺计划实施的滞后;同时,战时状态下的通货膨胀,也使修葺活动面临经济凋敝的窘境。故而纵使国民政府有意兴修文庙,奈何阻力过多,重庆文庙终究难逃被拆除的命运。<sup>[19]</sup>

### 三、孔庙庙产纠纷

孔庙庙产因受到冲击而引发的纠纷,并非近代所独有,在传统社会亦偶有发生,但在视孔庙为“圣域”之地的古代中国,这一现象少之又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降及清末民国,在儒学意识形态地位终结之后,孔庙庙产因被教育界征用或移作他用而引发的纠纷就不胜枚举了。

孔庙庙产纠纷不仅是新旧文化阵营的对垒,而且还夹杂着复杂的利益、权力与法律的纠葛,<sup>[20]</sup>同时也是管窥孔庙或其表征的儒家文化现代转型之艰的重要视点。目前学界对此已经有一些初步研究,如:张国鹏即以1917年孙增大拆毁嘉兴文庙一案为例,爬梳了造成纠纷的原因、不同群体的态度以及最终的解决方式,认为该案提供了了解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地方社会思想观念的独特角度。<sup>[21]</sup>唐仕春探讨了1917年广州市政公所因拆毁学宫兴修马路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作者通过地方绅民、市政公所应对纠纷的方式考察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的异同,认为广州市政公所的最终胜利揭示了广州市政公所所代表的新阶层,其力量在传统氛围中的上升。<sup>[22]</sup>庞毅则梳理了1921年湖南岳麓孔庙庙产纠纷案的来龙去脉,并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揭示了庙产纠纷背后的深层意涵,认为纠纷处理结果显示传统让位于现代

的趋势。<sup>[23]</sup>李先明以孔府档案馆所藏的相关史料为依据,以1930年前后河北长垣县两处民间孔庙祭田课租之支配权与主祭学录之人事权的纠纷案为切入点,充分挖掘和运用原始档案,考察了长垣县孔氏族人、县教育局、县政府、省民政厅、北平大学区教育行政院与曲阜孔府在此纠纷案处理过程中的不同态度与复杂博弈,进而揭示了孔庙原有的权力秩序被打破,代之以地方政府确立的新的权力秩序的历史进程。<sup>[24]</sup>黄国斌则着眼于国民政府处理庙产纠纷的管理政策,认为彼时当权者尽管颁布了多项庙产管理政策,但由于地方教育机构软弱无力以及财政支绌,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孔庙庙产纠纷的发生。<sup>[25]</sup>此外,龚鹏从长时段角度考察了民国时期陕南孔庙的变迁发展,并对陕南孔庙庙产的再利用以及庙产纠纷状况进行了初步探析,认为陕南孔庙庙产的占用、损毁状况仅为全国性庙产兴学风波的冰山一角。<sup>[26]</sup>

### 四、问题与展望

近年来,一系列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孔庙境遇的著述相继面世,为后发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但综合观之,学界对于此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约略论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学界对晚清民国时期孔庙价值功能定位与转换的研究不够充分。一方面,现有研究多围绕孔庙祭祀功能的嬗演变加以讨论,或是将孔庙的这一传统功能与其被新赋予的现代性纪念功能混在一起进行笼统地评述,而针对现代化语境下孔庙兴学、文物古迹、政治宣教等新被赋予的功能的专门性研究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多数研究是通过个案或区域性研究对孔庙的价值功能定位予以考证分析,如部分学者多以上海、陕西、江苏、曲阜等地的孔庙为例,而对更广范围内孔庙功能定位与转换之面向的关涉不多。

二是对孔庙修葺研究的关注面较为狭窄。既有研究多止于对修葺过程或修葺计划粗略描述,未能对修葺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运作详加考析,研究成果缺乏深度;同时,孔庙修葺问题一直贯穿近代历史,但学界鲜少关注不同时间段倡修者的人员结构、修葺原因、修葺经费来源、民众响应程度、修葺活动的空间布局等议题。此外,学界对一些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修葺事件也着墨不多,如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如火如荼修葺曲阜孔庙,但最终却不了了之的事件就未见有专文分析。

三是学界对于孔庙庙产纠纷的研究较为缺乏,且已有研究亦多为个案,这些个案研究虽可帮助我们了解孔庙庙产纠纷的具体状况以及区域多歧性,但个案呈现出的仅是诸多矛盾纠纷中的冰山一角,很多问题的答案难以从个案中得到推断。如仅有的孔庙庙产纠纷的个案研究表明,纠纷的发生多是个中利益相关者对孔庙庙产所有权、管理权的争夺而引发的。但实际上,从宏大背景来看,此中原因极为复杂,诸如庙产兴学的冲击、时人恣意变卖孔庙庙产、公产与私产的产权不清、法律界定不明确等等,都是导致庙产纠纷的重要环节。对此,学界尚无人予以关注。再如,兴学的孔庙种类、孔庙庙产范围究竟如何界定、孔

庙产纠纷的最终博弈结果及其总的发展态势等等,都有待超越个案研究,以得出总体性的结论。

基于以上缺陷与不足,今后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和深化清末民国时期孔庙问题的相关研究。

一者,拓宽孔庙问题的相关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如针对孔庙价值功能定位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学界应有意识地将孔庙祭祀、纪念以外的功能定位作为研究对象,并进一步扩大孔庙研究的范围。再如,在孔庙修缮问题的研究中,不同时间段倡修者的人员结构、修缮原因、修缮经费来源具体呈何种面貌,存在何种差异,造成差异的因素又有哪些?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亦应做出细致梳理。此外,造成庙产纠纷的原因、纠纷的表现形式、各方解决纠纷的方式以及异同等内容,也是未来学界厘清的问题所在。

二者,扩大史料的取材范围,尽可能呈现此一时期孔庙问题的整体面相。针对当前学界对清末民国时期孔庙问题的研究,多为个案探讨的事实,今后的研究着力点当扩大史料的取材范围,具言之,一方面继续充分利用《申报》《益世报》《新闻报》以及各地的政府公报、教育公报等文本中刊载的大量关于孔庙的史料;另一方面加强对档案文献、方志、家谱、个人日记等史料的发掘力度;此外还应将视野延伸至文献资料之外,相关石刻、时人口述资料都是获取孔庙记忆的重要载体。如此,多样多种史料相互印证,将有助于在更大范围或空间中呈现府、州、县孔庙,以及孔氏家庙等不同类型孔庙的“整体性”境遇。

三者,借鉴相关理论,改进研究方法,从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脉络中探究孔庙在清末民国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史料不等于历史真相,基于本论题的特性,研究者必须借鉴有关“空间”“仪式”“象征”“文化权力”等方面的研究方法,并从更长的时段中及近代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的图景中观照孔庙的近代境遇问题。如景军运用象征资本、知识、记忆等社会学理论对孔氏家庙历史变迁与家族发展间因应关系的考察,<sup>[27]</sup>以及李先明以河北长垣县孔庙纠葛为个案,在社会近代转型的脉络中对国家、地方、孔氏族人、衍圣公府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探讨<sup>[28]</sup>的研究理路便可以资借鉴。由是,如何运用社会变迁理论、社会控制理论、人类学的仪式理论、社会记忆理论,将孔庙的命运遭际问题置于清末民国时代大的社会图景中去考察,将是今后深化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着力点所在。

总而言之,学界未来研究亟需强化历时性和共时性两重因素,既要拉长时段,做到研究中的上下贯通,又需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阐发,以对孔庙的近代境遇问题进行总体的、动态的、类型化的评估。如此,才能有望克服现有研究中的缺陷与不足,推动孔庙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 注释与参考文献:

- [1] 张亚祥. 江南文庙 [M]. 上海: 上海交通出版社, 2009: 80.
- [2] 霍红伟. 晚清教育转型与府州县学的变迁 [J]. 学术月刊, 2010(2): 130-138.
- [3] 李俊领. 清末文庙祀典升格与人心失控 [J]. 史学月刊, 2012(5): 63-72.
- [4] 张国鹏.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晚清时期的文庙——以《申报》为基本史料 [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 96-105.
- [5] 柯必德. 天堂与现代性之间: 建设苏州(1895—1937) [M]. 何方显, 译.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
- [6] 陈悦. 在政治与文化之间迂回——近现代祭孔的衍化途径 [J]. 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52-57.
- [7] 马春霞. 民国通俗教育馆的国民常识启蒙及其困境——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 [J]. 终身教育研究, 2019(5): 55-63.
- [8] 张国鹏. 政权与信仰变革下的文庙 [D]. 天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2016.
- [9] 鹿毅. 晚清民初长沙官方祭祀初探(1840—1927) [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3.
- [10] 杨莉. 民国时期天津文庙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11] 黄进兴. 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61-274.
- [12] 整肃圣庙 [N]. 宗圣汇志, 1914-1(10).
- [13] 请求保管圣庙 [N]. 时报, 1917-2(6).
- [14] 李俊领. 清末文庙祀典升格与人心失控 [J]. 史学月刊, 2012(5): 63-72.
- [15][16] 王君怡. 郑州文庙研究 [D]. 郑州: 河南大学教育系, 2018: 19, 20.
- [17] 刘守柔. 从孔庙看民国时期历史建筑保护现象 [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15(2): 28-32.
- [18] 赖德霖. 新生活运动与曲阜孔庙保护: 中国近代文物建筑保护的一个契机初识 [J]. 史建筑创作, 2010(10): 186-187.
- [19] 杨宇振, 杜林东. 陪都重庆文庙修葺计划: 1941年 [J]. 建筑师, 2018(6): 43-51.
- [20] 李先明. 孔庙“庙产兴学”与文化权力的转移——1928—1932年河北省长垣县孔庙祭田纠葛案透视 [J]. 近代史研究, 2019(2): 92.
- [21] 张国鹏. 新学人与旧文化: 民初嘉兴拆毁文庙之探析 [J]. 历史教学问题, 2017(3): 13-19.
- [22] 唐仕春. “尊崇圣道”与“修明市政”之争——1919年广府学宫事件为中心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第2卷)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23] 鹿毅. 晚清民初长沙官方祭祀初探(1840—1927) [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3.
- [24] 李先明. 孔庙“庙产兴学”与文化权力的转移——1928—1932年河北省长垣县孔庙祭田纠葛案透视 [J]. 近代史研究, 2019(2): 81-94.
- [25] 黄国斌. 移风易俗: 南京国民政府文化导向研究(1927—1937年) [D].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2014.
- [26] 龚鹏. 民国时期陕南孔庙的变迁研究 [J]. 池州学院学报, 2016(1): 84-86.
- [27] 景军. 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天 [M]. 吴飞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3.
- [28] 李先明. 孔庙“庙产兴学”与文化权力的转移——1928—1932年河北省长垣县孔庙祭田纠葛案透视 [J]. 近代史研究, 2019(2): 81-94.